

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时期社会治理及其历史经验

王俪洁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时期社会治理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紧迫需要。通过创造性地构建适合战时国情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激发民族意识,凝聚社会共识,为有效社会治理培树科学理念;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为有效社会治理构建利益共同体;整治陋风流弊,规范社会行为,为有效社会治理营造良好风气;解决社会问题,做好社会保障,为有效社会治理提供强力调节,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转型。该治理模式不仅为战后社会变革奠定良好基础,也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4-0177-07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时空场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社会团体、公民等,通过建立平等、合作、协商的关系,按照规章制度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的实践活动。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全面抗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全新的国家和社会,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封建主义残余并举,在深刻总结分析全面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采取多种举措和手段,推进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创新,取得重要成就,建成了一个被誉为“中国进步的象征和光明的指针”的全新社会,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一、激发民族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培树科学社会治理理念

近代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萌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求各民族相互平等尊重,携手并肩、融合发展;外抗强敌入侵,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现代化发展,实现从自在的民族主体向自觉的民族主体转变^①。党的二大宣言深刻揭示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悲惨处境,并首次公开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阻碍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恶魔,中华民族要取得民族独立自主,必须团结一致,建立真正自主的国家^②。在投身大革命洪流和掀起土地革命风暴中,共产党人“领导各民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思想。在江西瑞金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共产党在民主选举和监督中强调平等地保障各民族的政治权利。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制定保护少

收稿日期:2025-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VRC00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1ZDAM04)

作者简介:王俪洁(1997—),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陶斯文,蔡林:《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域政策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与当代价值》,《民族学刊》2024年第11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数民族利益的政策,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们平等发展的权利。

全面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培养民族意识,凝聚社会共识。1939年,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界定。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拥有规模很大的人口的国家,除了大量的汉族,还有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和优秀人类文明遗产的民族,不但刻苦耐劳,而且热爱自由,勇于斗争^①。从领土、历史、精神、文化和民族结构、传统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有机构成和整体特征,科学定义了“中华民族”“汉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实现了对少数民族身份、文化和政治地位的普遍承认。毛泽东在构想未来社会时,还以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基本单位,定义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②,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党的政策方针紧密结合,阐明党在民族独立自主和强盛中的使命和任务,描绘中国未来美好图景,从而增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的认同,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和信念。

随着中华民族观念深入人心,民族自信心得到激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形成社会共识,为抗战建国汇聚了磅礴力量,引领社会治理纵深推进。抗日革命根据地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施政纲领,法定性地规定民主政权建设中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任务,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全方面满足利益需求,让各族民众深切认识到个人利益、本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激发各族群众最朴素的民族情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来组织中华各民族共同管理社会事务。“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③“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转变,实现了将民族意识嵌入基层社会的目的,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发展了经济社会文化,调节了各方面的矛盾,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社会基础,更为新中国民族政策奠定了理论框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了民族意识觉醒,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从包含民族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整体视角来看,其在民族意识培养和社会共识凝聚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系统建构,不仅成为毛泽东思想引领民族意识的培育与社会共识的凝聚的方法论基础,也为近代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例如,毛泽东思想让各族民众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症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社会治理路线,精准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制定契合的政策,从政治平等保障、经济帮扶推进到文化尊重弘扬,全面增强少数民族对党的认同、对国家的归属感,提升各民族间的团结意识。概言之,毛泽东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构民族认同,以群众路线的民主机制整合社会利益,以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捍卫国家主权,成功唤醒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成全民族抗战的社会共识,实现民族意识与社会共识广泛凝聚和根据地蓬勃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强化其在社会治理中凝聚社会共识的引领作用。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通过推动各族民众交流交融,全方位嵌入,打造民族共同体,为形成社会治理理念提供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社会共识不仅是真理问题,也是价值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了中华民族对未来生活、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行和发展、社会秩序得以有效整合和维系的“价值公约数”^④,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制度保障等多种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④宋友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表达及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年第1期。

价值观转化为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情感认同，并外化为日常行为习惯。最后要运用和坚持“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其为指引能够为培筑民族意识、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价值根基、精神动力、发展路径、实践基础、方法支撑和全球视野。

二、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治理利益共同体

社会关系影响社会主体的利益平衡，直接关涉社会治理绩效。全面抗战时期，为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凝聚社会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致力于解决好、维护好、实现好各阶级力量的利益关系。

一是实行“减租减息”和“劳资两利”，平衡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是全面抗战时期为广泛团结农村各阶层一致抗日的一项土地政策，主要目的是缓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从而实现地主农民团结抗日。一方面，明确地主拥有土地，农民租借耕种，但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提高农民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地主地权、财权等权益，使地主成为抗日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在科学理论和正确土地政策的指引下，协调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地主与农民献身革命的热情。劳资两利政策的颁布主要是为了调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同时，联合资本家抗日。一方面，需要不断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提高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斗争性。另一方面，保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有利可图，将其充分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减租减息”和“劳资两利”虽然分属不同的时空场域，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的实践。前者以农村土地为工具，以农民“减负”和“保障”地主利益来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后者以工商业等行业为阵地，以维护工人利益、让利给资本家为抓手促进和恢复生产，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有效方针。

二是实行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利益。“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①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三三制”政权正式确立为党在全面抗战时期适应半殖民地社会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并试图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实现政权改革。“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②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自由的选举方式，建立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充分参与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虽然在选举过程中存在机械凑成比例、共产党对选举过度放手等问题，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及时调整政策，使得“三三制”政权符合“重权威，求民主”的政治国情，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有效整合了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为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创造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

三是推进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转变，维护各阶级阶层的文化教育利益。党在提高军队战斗力进行武力反侵略的同时，还注重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发展干部教育、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维护群众文化教育权利，在文化教育层面增强抗日战争软实力。关于开展干部教育，毛泽东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③。党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通过整风运动建立了干部在职学习教育制度。中央设置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党还领导成立大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干部教育学校。关于基础教育,针对青少年接受教育困难的状况,党领导建成大量中小学校。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至1941年小学达1341所,学生4万余人;晋绥抗日根据地至1941年创办了小学2136所,学生8.7万余人。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打破了地主阶级对文化教育权利的垄断,推动社会代际流动。关于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农民夜校、冬学、识字促进会和巡回训练班等方式。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如在晋绥革命根据地,至1945年初,冬学总计2281处、学生132820人,达到最高点^①。以扫盲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教育,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延续发展的道统和社会秩序,乡村草根精英快速成长。另外,党在通过教育培育革命力量的同时,也注重对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充分发挥他们在教育等领域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②。在强调尊重、团结、信任知识分子,使他们才尽其用的同时,他清醒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缺点,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实现自身“工农化”和“革命化”。

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的社会治理注重各阶级群体的利益协调,实现了既服务于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整体目标,又兼顾社会治理各主体的合理诉求,实现了“整体统领部分、部分支撑整体”的动态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职业群体和阶层不断涌现,传统群体也出现利益格局变化。虽然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协调不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走向对抗,进而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协调各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强调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③。一方面要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在协调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时,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解决因为物质利益引发的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④。

三、整治陋风流弊,规范社会行为,营造良好社会治理风气

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乡村,加之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和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风气改造任务极其艰巨,社会行为规范、习惯和风俗亟须党领导政府采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一是破除封建迷信。中国乡村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和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乱,“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⑤。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普遍存在鬼神崇拜、占卜问卦、巫医治病等现象。如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保德下流碛村,254户家家供神,还有四个神公神婆,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场合都要贴神符^⑥;在陕甘宁边区,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农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迷信、不卫生的苦头^⑦。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掀起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运动:积极开展对巫神的斗争与改造;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压缩迷信活动生存空间;开展扫盲运动和发展国民教育提高群众对封建迷信的抵御能力;改造、打击、瓦解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概言之,通过思想改造的自我呈现与组织纪律的社会再生产,根据地破除迷信工作超越了西方相关社会理论的简单逻辑,催生社会现代性的成长。

二是严禁吸毒贩毒。全面抗战时期,烟毒在各抗日根据地大肆泛滥,严重影响根据地生产活动、社

^①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③习近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5年第2期。

^④习近平:《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人民日报》2014年4月27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683页。

^⑥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1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会秩序、精神文明。1936 年,埃德加·斯诺在去往延安的路上看到“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①的景象。据统计,1936 年,延安城有居民 1 096 户、4 841 人,有官办烟馆 5 个^②。鸦片种植者、售卖者、吸食者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产业链。面对严峻的烟毒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一系列法规法令,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禁毒工作。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办法》等十多个法规,还设立禁毒机构,对人民群众进行各类禁烟禁毒宣传教育,帮助吸毒者进行戒烟戒毒并恢复生产。党领导的禁毒工作有效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化政策,保护了群众身心健康,维护了社会稳定,重建了民族精神。

三是改造“二流子”。全面抗战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存在相当数量的“二流子”。为解决根据地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劳动生产力短缺问题,稳定抗日民主政权、塑造淳良民风,抗日根据地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二流子”采取批评教育与群众的监督帮助相结合、开会批斗和强迫劳动、具体帮助与促其自新、制定村民公约约束二流子的不良行为等措施^③,将“无益或者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构建起“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还率先将改造“二流子”列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任务,一批“二流子”转变成劳动模范。延安地区有名的“二流子”刘生海还被毛泽东亲自接见并表扬。在劳动生产中改造“二流子”,不但充实了农村劳动生产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获得大多数人认同,巩固了社会的安宁^⑤。

四是改革旧式婚俗。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传统婚姻制度下的恶习,诸如早婚、买卖婚姻、童养媳、重婚、纳妾等陋习普遍存在。在太行地区,不少农民在子女幼时就安排结婚事宜,有的甚至还在子女未出世前就为他们订婚。买卖婚姻在农村也较为普遍。1940 年前,晋察冀边区 70% 的婚姻需支付高额彩礼。女性被明码标价,如太谷县订婚价格按年岁计算,每增一岁加 10 元伪币,寡妇有卖 120 元伪币的^⑥。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诸多举措治理旧式婚俗。首先是制定系列法律法规,如《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法规既有现代化意义上的法律精神,又具有诸多本土化特征,既体现了理想性,又回应了现实实际。其次是做好思想宣传工作。抗日根据地通过报纸刊物和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歌谣、秧歌、戏曲等形式揭示旧式婚姻的危害。最后是通过组织女性参加生产运动和选举活动,提高女性的文化知识水平,保护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将她们从旧式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政府在移风易俗和规范社会行为方面取得重要成绩,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延安还形成毛泽东所称的“十个没有”的社会风气,为当今社会治理实践提供历史借鉴。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风气治理,从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⑦他强调要抓主要矛盾,从公共权力运行的优势着眼,以优良党风政风建设为重点带动全社会风气好转。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特别是严抓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引导社会风气持续好转。习近平还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和规范社会行为提出具体要求,强调德治和法治结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⑧。

四、解决社会问题,做好社会保障,提供社会治理强力调节

人的需要是人类生存的本性,也是人类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就是为了人的生产和发展,故实施这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 页。

^②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4 页。

^③ 张俊涛,宿志刚:《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与和谐社会建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④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56 页。

^⑤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4 页。

^⑥ 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5 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7 页。

^⑦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

^⑧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 年第 1 期。

一制度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发展,立足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颁布了系列政策、法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救助保障工作,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是赈灾救济,安置优待移民难民。抗日根据地政府对移民难民采取妥善安置、发放救济粮款、鼓励生产等措施。一方面为难民提供贷粮,组织干部以身作则节约粮食,必要时还发动当地老百姓向难民借贷粮食。另一方面给难民安排住所,解决住宿问题,并提供生产资料,传授生产技术等。《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行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且3年免收公粮及其他义务劳动;开垦之私荒,3年免缴地租,且地主不得任意收土地^①。在解决移民难民问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生活、生产陷入困境的灾民群体,主要采取两种应对方式:一是直接救灾。主要包括发放赈济、余粮调剂、组织募捐、创建义仓、提倡节约、减轻负担等;二是生产救灾。主要手段有:以工代赈、发放农贷、抢收抢种、发展副业等。抗灾救荒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仅有效破除了“灾荒—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且有效地将灾荒危机转化为政治认同,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二是剿匪锄奸,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全面抗战时期,匪患和汉奸问题严重影响抗日根据地安定团结。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中指出:“初到江南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江南‘闹匪’问题的严重,抢案日夕数起,‘炕山芋’(绑票)威胁着江南人民;某些地区,黑夜当土匪,成为当地人的一种副业。”^②1937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境内外的40多股土匪(4000多人)实施破坏活动,抢劫人民财产,杀害抗属和伤残人员,破坏交通要道,甚至袭击基层党政机关。对此,党领导根据地政府开展了系统治理,在注重武力清剿的同时,又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既注重军事打击又注重社会根治;既注重法制威慑又注重道德教化,积累了彻底解决近代中国匪患的成功经验。在注重剿匪的同时,党领导开展了反奸细、汉奸斗争。“如果不加强锄奸工作,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③党领导制定的《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关于剿匪工作的训令》等文件,从政治瓦解——“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组织建设——“建立专门的工作部门(社会部)”“从中央局到地委成立保卫委员会”^④;群众路线——反动群众大规模开展反奸细工作等方面推进反奸细、汉奸斗争,扩大和巩固了民族统一战线,塑造了社会道德秩序和培养了民族精神。

三是安置弱残,救助老幼军属群体。关于儿童的收容和救济,党提出“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和“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坚持“保教合一”的教育原则,制定了系列儿童教育的方针、政策,设立儿童保育机构,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关于养老问题,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救助。对拥有生产资料但没有劳动能力的,发动群众或者代耕队的方式提供帮助;对既没有生产资料又丧失劳动生产能力的,则发放一定的款项或者生活资料。如在山东蓬莱地区动员中富农帮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耕种^⑤。有的还尝试推行养老保险,提出“厂方在工资以外,按工资十分之一存贮作劳动退休金”^⑥。这些举措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关于军属的救助,抗日根据地颁布系列政策文件,诸如《晋察冀边区抚恤残废军人办法》《鄂豫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等,将“保家卫国”的政治口号转化为落实关涉广大民众具体利益的行动,重构乡村社会伦理。

四是防治疫疾,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抗日根据地大多医疗卫生条件极端落后,加之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医疗卫生状况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更加恶化,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极其恶劣,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1940—1941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疗队对河北唐县、灵寿、阜平3县13.3万余

^①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②马洪武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2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9年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276页。

^⑤烟台市民政志编纂办公室:《烟台民政志》,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496页。

^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7.7—1945.8)》,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人的调查显示,发病人数占 83.1%,死亡人数占 15.1%^①。面对严峻的形势,根据地政府推进医生队伍和医疗机构组织建设,健全医疗卫生体系。晋绥边区开展全民防疫,公布疫情信息、颁布防疫法令、研制防疫药品、免费医治病患、强调中西医结合、实施封村隔离、开展卫生清洁运动等。陕甘宁边区成立领导组织、开展卫生宣传、健全医疗机构、创新防疫机制、增强人民群众体质等^②。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改变了军民医疗卫生习惯,提高了军民身体素质。

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做好社会保障,满足了军民基本生活需求,增强了社会韧性和耐性,保障了全面抗战持续推进。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重视人口老龄化、就业医疗、抗灾救灾和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等社会问题。他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问题矛盾增多的情况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③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④。新时代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做好社会保障工作,首先要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等方面着手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权利,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其次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紧盯制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硬骨头,不断推进改革^⑤。最后要明确新时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路径。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不能停留在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层面,更要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等提升,实现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建设要走法治化道路,实施精细化、规范化措施。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Liji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ocial governance addressed the urgent need for national survival. By creatively constructing a quadrilateral governance model suited to wartime conditions, it achieved the following: inspir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onsolidating social consensu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coordinat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reforming harmful customs and regulating social behavior to foster a positive atmosphere, and addressing social issues and ensuring social security to provide strong regulation. This has not on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ost-war social reforms, bu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for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ocial governa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责任编辑 葛丽萍)

^①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7 页。

^②陈松友,杜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③《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时强调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 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 年 4 月 28 日。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4 年 5 月 1 日。

^⑤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2022 年第 8 期。